

学术事功俱隆 文章道德并富（上）

——回忆先师顾廷龙先生

沈 津

顾老走了，永远地走了。这是所有认识他和了解他的人十分遗憾的。顾老是1998年8月22日晚上9时6分病逝于北京人民医院的。24日晨9时（美国东部时间为23日晚9时）上海图书馆办公室即时将这个信息用电话通知了我，次日我即向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请假，并向旅行社订购飞往北京的机票，赶在追悼仪式的前一天下午抵达北京。在顾老悼念仪式上，顾老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慈祥地躺在鲜花、松柏丛中。悼念的人很多，约在400人左右。人们鱼贯而入，三个一排地依次向顾老鞠躬告别。当我在向顾老三鞠躬，并将红色康乃馨置放在顾老遗体上时，那三十年的师生情，早已化作泪雨，夺眶而出了。我抽泣着，语不成声地告诉顾老：“我来了，我来看您最后一面，送您最后一程。”难过的我在和顾老的哲嗣诵芬先生握手表示慰问时，竟说不出一句话来。

在北京八宝山追悼顾师的会场外，中华书局的张世林先生命我写一篇回忆、纪念顾老的文字。他说这篇文章非你莫属。我想，这大概是1997年4月初，他和张力伟先生去拜见顾老时，顾老告诉他们，他带过二个学生，其中一个是我的原因吧。古人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今之鲍叔，顾师也。一个人在他的正常

成长过程中，有过不同的老师，从孩童时代的幼稚园到少年时代的小学；从进入青年时期后，就是中学、高中、大学的求学阶段，十多年的时光，也会有数十位老师。然而，在问学、治学的道路上，最不可忘怀的可能仅有那么一、两位而已。这样的导师或许会影响他的一生，而作为学生，也会把导师的一言一行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当作自己的楷模，去实践、再实践。顾廷龙先生是我的导师，是我追随杖履三十年的导师。

顾老，名廷龙，字起潜，号匋谿，别署隶古定居主人、小晚成堂主人。笔名路康。1904年生于苏州的一个书香门第。1931年毕业于上海持志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取北京燕京大学研究生院专研古文字学。1932年任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文采访部主任；1939年，应叶景葵、张元济等先生之招，至沪筹建私立合众图书馆，为总干事；1956年任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馆长；1962年任上海图书馆馆长。1985年任上海图书馆名誉馆长。他也是文化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二、三届副理事长，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

—

顾老在60年代初亲自带的学生仅有我和吴织二人，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他在晚年还为上海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带过几位研究生。我追随顾老，是在1960年冬。那时，上海有关文化部门考虑到在戏剧口、美术口、图博口等方面有一些学有专长的艺术家、专家、学者，他们的年龄逐年增长，应该在他们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将他们的一技之长传下来，使之后继有人，不致断档。我和吴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组织决定调至顾老身边工作，从他为师，学习古籍版本、碑帖、尺牍的鉴定、整理，并且研究目录版本之学。

1962年11月，上海市人民政府任命顾老为上海图书馆馆长。但是，顾老除了在馆长室参加会议外。他每天都坐在善本组办公，公文往来有时是秘书送来，或我送去。那时善本组办公室里还有潘景郑先生（著砚楼主人）、瞿凤起先生（铁琴铜剑楼后人），而潘和瞿二人也都是国内重要的目录版本学家。顾老是相信实践出真知的。所以，他对我的教导也都是从实践入手，就是让我在工作中去增长知识、提高才干、扩大视野。1961年到文化大革命前止，除了管理善本书库、接待读者阅览之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是每天，顾老都会让我去大书库、旧平装书库、普通线装书库查书，他往往就某一本书、某一个人、某一件事作一个提示，然后告诉我应该去查什么工具书、参考书。对于这种实质性的训练，当时我并没有什么大的感觉，只是想快些查到，查不到的再去问顾老，还有什么线索可以去查。当然，他还会作新的提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日积月累的经验中，我不知不觉地对许多工具书、参考书都能应用自如了。

目录版本之学，是一门实在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的，这一点并非空谈者所能得知。若没有大量的实践，那就是把善本书放在面前，也会无法鉴定。我清楚地记得，顾老第一次教我辨认版本的事，他拿了一部活字本和一部木刻本给我，让我看两部书有什么不同。在这之前，我曾读过刘国钧的《中国书史简编》，对活字本有点理论上的知识，但从未结合到实际上去运用。我在比对后向顾老说了。他说，很好。接下来他就两书之特征及要注意的地方、鉴定的方法详细地告诉了我。顾老80年代后期对我不止一次地说过，“有些人不懂鉴定版本，是因为没有实践，或是没有书可以比对，但是这种人可以请教专家，他们可以进步。麻烦的是不懂装懂，又不查书，又不比较，这种人是有眼无珠。”

在各种版本的鉴定中，最难的是抄本、校本、稿本。对于旧书店、古籍书店收购处的工作人员来说是最棘手的，他们自己都

认为稍一疏忽，就会看错，或会将名家批校看成后人过录，或对后人作伪而未能识破，从他们的角度去看，是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对于一些收藏古籍的公共图书馆、大专院校馆或其他馆来说，如果著录错误或不准确，那就会误导读者，使读者或研究者迷惑。顾老对鉴定这类版本有他的独到之处，他是书法家，对于文人如何起笔、落笔了如指掌。有时，他在看清代学者书札时，会把我叫到旁边，指给我看，这一笔有破绽，那一笔不好，这一顿笔、那一点，某人决不会写出这种字，这不是某人所写，而是后人摹仿的。他告诉我，“一般来说，藏书家或学者在书上写有题识跋语，都是事先想好的，或有草稿，然后一气呵成，笔墨自然，而且连贯。如果是作伪，那作伪者的心态就是要尽量摹仿逼真，就似临帖一般，没有韵味，也就没有气，所以写出来的字必定有破绽。”

正因为如此，他要求我一定要写字，要念古文。那时，我每天都会在工作时间里写字一小时，写在用毛边纸订成的大本子上，每星期送给他看一次。古代的书法家很多，但他希望我能临写唐代书家褚遂良的碑和帖，他说褚字不错，褚初学欧阳询，继学虞世南，后取法二王，融会汉隶，自成一格。他还拿了几本商务印书馆印的《四部丛刊》给我看，说你看这些题写的书名都是褚体，精妙俊逸、绰约丰姿，有自家面目。所以我最初临的就是《孟法师碑》、《伊阙佛龕碑》、《雁塔圣教序》以及《倪宽赞》。有时，顾老会站在我旁边，看我临写。兴趣来时，他也会坐下来，临一行两行给我看，那时就可看他如何运笔了。他讲临字不要太像，但要神似，掌握规律。后来，工作太忙，写字就由白天而改成晚上了。

1961年冬，顾老每逢星期日上午必定到上海图书馆长乐路书库（原历史文献图书馆所在地）去半天，他在那儿翻翻书、查点资料，总之他对那个地方有着深厚的感情，毕竟他在那个地方住

了十多年了，他在那儿付出过许多辛劳和汗水，那儿的许多图书都经过他的手，有不少线装书还留有他所写的书签。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我也在休息日去半天。我一直认为我较其他人幸运，因为那一天，我们可以面对面的坐着，我可以静心听顾老讲各种事情。顾老最喜欢说的就是他当年和章钰、王同愈、叶景葵、张元济等人相往来的事。他对这些前辈都是非常尊重的，老先生们熟于前朝旧闻、乡邦掌故，于金石书画、版本目录皆有造诣，故顾老时时登堂展谒，获聆绪论，相与赏鉴，相契极深。顾老也对我讲过“合众”的历史，讲抗战时他主持馆务之维艰，讲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进驻骚扰、地方上的流氓痞子敲诈勒索事给我听。他也讲过如何在废纸中抢救文献的事。

在顾老身边久了，你会发现他爱书、爱图书馆、爱他所从事的事业。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曾批判他说的“片纸只字皆史料”的观点。实际上，在顾老的眼里，只要是书，只要有一点价值，他都不会轻易处理。他曾说过“古代文献，为研究历史、保护文物者所重视，即片纸只字，亦均珍同球璧。”他曾对我说，“有些书对你来讲，很陌生，因为你不研究，不研究但不等于没用，要研究的人就会去找这种书。所以对图书馆来说，它的藏书是要给人用的，光收藏，不利用，那是封建时代藏书楼的作法，今天的上海图书馆一定要改变过去的做法。”他还就上图中文采编部采购新书的事对我说，采购是一门学问，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这要凭经验，要了解读者的需要，不是光看新书简报就行，要走出去，跑得勤才行。图书馆里什么书都应该有，小菜场里青菜、萝卜，各人喜欢。他对上图的老采购孙耀昌的工作是满意的，而孙过去在苏州、上海的旧书店待过，熟悉图书。60年代初的上海古籍书店货源充足，门市上也会偶尔收进一些罕见的珍本，包括各家抄本、名人稿本等。而上海图书馆采购古籍的经费还可应付。在这种情况下，上图善本组可以不断地补充馆藏。每逢潘景郑、瞿凤起先

生去古籍书店选书时，顾老要我和他们一起去，他对我说，“你选书没有经验，但不必怕选错，不要有负担，只要你觉得这部书可能没有，那你就挑出来，让书店的工作人员送来，你再查有还是没有。书在手上，几个来回，你就会了解什么书该买，什么书不该买。”只要有会，顾老总是为我和吴织创造条件，他请潘、瞿两先生去上海海关、上海古籍书店、上海朵云轩鉴定出口的图书、碑帖时，也把我们两人带上参与工作，去逐步熟悉业务。

顾老对于抄、校、稿本的兴趣最大，他喜欢看，喜欢研究。他对各家之笔迹，眼明心细，不爽毫黍，他往往能从一本原题“佚名”著的稿本中找出线索，进而查出作者，这些都是真本事。记得70年代初，在馆藏中发现一部破烂不堪的稿本，书名题作《声韵考》，作者不知名谁？经顾老考证，发现这是清代学者戴震所著，且为李文藻墨版底本。他还鉴定出书中有段玉裁手书及孔广森笺注。他曾针对有些人不重视小稿本（指不太有名的学者的稿本）而对我说，“不要看不起小稿本，有些小稿本倒还真有些资料价值呢。”

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我有幸随侍顾老出外看书，他每一次出去，身边都带一本《增定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上面有顾老细字批注。他说一般的善本书查查《标注》就可以了，出外带这本可以暂时应付。他随身又总是有一个小本子，遇到什么新发现随手就记下，如1978年在天一阁，他对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集韵》特别有兴趣，最后他将段玉裁、阮元的题跋全抄下来了。这也为他1983年时写作“影宋抄本《集韵》跋”时提供了重要参考。为了使我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他总是要我先看，提出初步意见。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杭州，余姚县文化馆的同志得悉后，即送来一个明人卷子请求顾老鉴定。按老规矩，我细细看后，说有点问题，可能靠不住。他看后说，不真。然后告诉我，纸确是染色，铃印打的不是地方，更重要的是书法中破绽，他一一指给我看。还

有一次，我们在四川眉山县“三苏文物保管所”参观，在“三苏祠堂”里陈列了一些“三苏”的版本，其中有宋刻本、元刻本。他要我看一看有什么著录不对的地方。他说这也是一种机会，在外面看是锻炼你的直觉，和在馆里看感觉上是不一样的。

顾老 60 年代因忙于行政工作，又有不少社会活动，所以写的学术性文章不多。我曾为他抄写过几篇文章，如《杜臆》前言，《顾嗣立与〈元诗选〉》等，那时没有复印机，我就用复写纸写成四份。顾老每修改一次，我都要再抄一遍，他每篇文章多要修改三、四次。他说，“写文章是发表个人看法，是给人看的，送出去发表前还有机会修改，现在多一个人看看有好处，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总之尽量避免错误。”这完全可以看出老先生的谨慎。确实，他做任何一件事都是认真的，从不马虎。他曾对我说过，“做任何事都要认真，不可轻浮。尤其是做‘学问’，‘学问’二字，一是学，二是问。学是自己要刻苦；问就是要不耻下问，你不懂的事就要去请教别人，我、潘景郑、瞿凤起，你随时随地都可以问。”

顾老是一位学者，在他身边工作，不光是学习业务，还可以学到其他许多知识。他有时将批改公文交我送办公室秘书誉正发出，我就会看原拟的公文是如何起草的，顾老是怎样修改的，为什么这样改。顾老曾对我说：“写字除了给自己看，有的还要给别人看，字要写得清楚，人家才看得懂，所以做任何事都要想到别人。”对于公文的修改，他举过一个例子给我听，他说的是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清军的一位将领打仗老是败阵，后来上司在上报时写道，此将“屡战屡败”，到了幕僚手上，被改成“屡败屡战”。如果按照原先所写，那将领必遭革职查办，甚或斩首，而后改一字，性质就变了，变成虽败犹英勇骁战。因此，他说：“措辞很讲究，既要不费笔墨，又要说明问题，所以写好公文也是一门学问，你也要慢慢学。”

他曾对我说，凡是重要的工具书、参考书要自己买，就像身

上穿的衬衣衬裤一样。图书馆的书虽可以借，但不能在上面写上自己的看法。顾老赠我的书中有一些是业务用书，如《明代版本图录》、《涵芬楼烬馀书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晚明史籍考》、《劳氏碎金》等。其中的《涵芬楼烬馀书录》有张元济先生和顾老、胡问楷先生的手校，这是刊印前的校样，后为顾老重新装订者。书中张校为墨笔，顾、胡校为朱笔，也有墨笔，从中可以看出三老校得非常之仔细，甚至有个别字不整齐，略现歪斜，他们都一一指出，更不必说其他文字错误了。我曾就校样事请问过顾老，他说：“做事情要认真，不可轻浮。老辈们做事，一板一眼，从不马虎。”他还回忆当年受张元济先生之命，佐理校印《涵芬楼烬馀书录》之事，那时张先生卧病在床，如若顾老去时，张则口授指划，如某篇某句有误，应如何修正；或谈版本中某书某刻优劣之所在。盖顾老追随前辈，辄诣请益，获知良多。

我是深深感受到顾老对我的栽培，他对我的成长用心也是良苦的。60年代初，有一个时期，我晚上大看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什么《红日》、《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等，一本接一本。顾老直接了当地对我说：“看一本长篇小说，要花不少时间，还不如等这些小说拍成电影后，你看电影，只要一个半小时就行了，小说中的内容都浓缩到电影里去了，你的时间就可以省下来了。”自那以后，我就不再看小说了，再好的小说我也敬之远之了。那时，中国乒乓球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国内打球的人愈来愈多，我也是爱好者之一。当时，我在业余时间参加一个区乒乓球队，晚上多有训练、比赛，人也很累。顾老知道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的球打得再好，也只能打到上海市队，但那是强手如林，打进去好不容易。我认为你打球适可而止，中午休息时玩玩，你应该把打球的时间用来学业务，这一行人才太少，你应努力才是。”顾老说这些话，真是有点恨铁不成钢，他希望我能快快成长起来，他要想方设法对我引而教之。

30年代初，顾老在北平燕京大学求学，住在他的族侄顾颉刚先生家，顾家挂有一块方匾，上书“晚成堂”，据颉刚先生的意思，堂号“晚成”，有两个意思，其一是学问总难以一时作出轻易的结论，要到晚年才可有一些确实的贡献。也就是说欲速而不达。顾老在颉刚先生家，在那儿读书、做学问，受颉刚先生的影响是很深的。他的“吴宪斋先生年谱叙”就是在顾家写成的，末后署有“作于小晚成堂”。顾老很欣赏“晚成”，他对我的愚钝，认为是孺子可教，他也要我努力工作，增长才干，希望我“大器晚成”。70年代末，我曾想做二件事，即是编《明清室名别号索引》及《明人文集篇目索引》，而且我已上马，积累了不少材料。有一天我将此事告诉顾老，谁知顾老一听，马上就说，“你不要去做这二件事，你的精力一定要放在编纂上海图书馆的善本书目卡片上，你的责任很大，这些事已经够重的了。你一定不要锋芒毕露，眼光要放远一些。你要大器晚成。”他又说，“这二部书虽然有用，但是应该别人去编，你不应去做，对于你，太浪费时间的事不要做。这个话，我也只能对你说，对别人我不可以说。”我当然明白顾老话的意思，实际上，顾老的话是出自他的内心，说明他对我的爱护。顾老的话对我也是有如醍醐灌顶，这次谈话后不久，我就将所收集的室名别号全数赠于正在编《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的朋友了；而抄就的明人文集篇目部分卡片也送入了废品回收站了。

我和顾老相处的三十年，深深感到他的为人高尚，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孔子家语》有云：“大德必得其寿。”对于顾老来说，他的长寿和他的大德有关。在他的身边久了，就会感觉他颐养情性、仁爱宽厚、明智通达、对人宽容、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一面。他1994年为吴织写的楷书“知足长乐，自得其乐；助人为乐，为善最乐”就是他的最好写照。他那种扬弃私欲，淡泊名利，宁静致远，凡事从不斤斤计较，不去攀比，从不参与不必要的纷争。这些品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尤其是在今天。80

年代初，就有不少人写信或找上门来，希望能为顾老写些介绍的文字，但顾老都婉言谢绝了。他最简单、谦虚的一句话就是：“一个读书人，有什么可以写的？”一直到1986年，吴织才获准为他写了一篇“书海五十年——记顾廷龙馆长”。顾老做有些好事是不愿声张的，好像是1964年，江西省老区一个小学的几位少先队员给他写信，希望顾老能赠送一些儿童读物给学校，他们盼望阅读。顾老把信交给我，让我去书店选一些图书。后来我去上海旧书店替他买了数百本连环画和儿童读物寄出了。顾老还叫我不要外面去传。记得刚粉碎“四人帮”不久，北京《文物》发表了一篇某教授关于《京本小说辨疑》的文章，认定学者缪荃孙有伪造之罪，并列举所谓证据。我在当时就新发现的明刻本孤本小说《出像批评海陵佚史》以及未曾引用的资料撰文指出所谓《辨疑》的证据不足，论证有误。文章写成初稿后，我拿给顾老看。他看后说，不要急于发表，先放他一马吧。

顾老对我除了在工作上的指导外，还指导我收集资料做清代乾嘉学者翁方纲的研究。他说：“古籍版本的鉴定说到底，虽然只是技术性的工作，但是却包含了很多文史方面的知识，你不仅要多看、多查、多请教别人，在打下结实的基础后，你还必需学会如何做学问。”他还建议我不妨从研究一位清代著名学者做起，他给我出了个题目，即从各种书、碑帖（拓本、影印本、石印本）、字画中辑出翁方纲的题跋，最后运用所获得的资料编成《翁方纲年谱》。他说：“翁方纲这个人活了八十五岁，寿很高，在乾隆、嘉庆间他所经眼的金石碑版，数他最多，有不少还有他的题跋。而且他的朋友、学生多，其中不乏官场人物、也有诗人、画家、收藏家。他又是诗人，留下的诗作多达数千首，同时他又是著名书法家，清代所云四大书家翁（方纲）、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第一个就是他。你若好好对这个人加以研究，那不仅仅限于了解各种金石碑版、字画书籍的鉴定、流传，而且对于他周

边的人物、当时的时代背景、政治、经济以及文人学者之间的关系，你就可以弄清了。这对你的帮助会很大的。”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在顾老的指导下做起了翁方纲题跋的辑佚工作，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我从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许多地方居然辑出了翁跋一千三百余篇、翁方纲致友朋手札数百通。有不少都是从难得一见的翁氏手稿本、宋代拓本、旧拓本中录出。1985年底，我带着《翁方纲题跋》（一百万字）和编就的《翁方纲年谱》（三十万字）稿本到他家里去，我说：“顾老呀，您1961年时给我出的题目，我现在完成了，现在向您交卷。”顾老笑了，笑得很开心。他略为翻了一下，就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为翁方纲写年谱是值得的。”后来，他为这两本书题了书签，并在1986年底的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的发言中，专门提到了整理、出版翁方纲手稿的事。

1975年夏，我在一包明刻残页中偶然发现《京本忠义传》残页，仅存第十卷第十七页的下半页、第三十六页的下半页，并各残存前半页的后三行。我因其字体、纸张俱似明嘉靖物，故特翻检各家书目并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但均未著录。次日，我即持残页请顾老、潘景郑先生审定，他们都认为此虽为残页，但不可小看，或许是《水浒》的一种早期刻本。后来顾老和我合作写了一篇“关于新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叶”的文章，从残页的字体、纸张、卷回、标题、图案、正文，来考证它应更接近于《水浒》的原貌。之后，顾老即建议将这二张残页用上等毛边纸影印，并配以前言，装订成册，除大部保存外，也有一些赠送给来上图参观访问的海外图书馆界的同行。继《水浒》残页后，我又在另一明周显宗刻本《陶渊明集》的衬纸上发现了《三国演义》的残页，为卷八第十五回“太史慈酣斗小霸王，孙伯符大战严白虎”的上半部分，是过去研究《三国演义》者所从不知晓者。我根据残存衬纸的字体、纸张、文字等进行鉴定，认为此种刻本

应在明嘉靖之前，或在明成化、弘治间。那时，顾老在北京探亲，我就将衬纸的复印件和我的看法写信告诉他，并请顾老验正，也就近请北京图书馆冀淑英、丁瑜先生鉴定，听听他们的意见。1989年8月，顾老给我的复信说：“《三国志》残叶印本，我给冀大姐看，她说早于万历，丁公看万历，我是望高看的，同意冀老的意见。您的细心发现，很高兴。这不仅发现残叶的本身，而可使全组（指古籍组）同志有所感受，比讲堂上讲多少时为有效。”

我在主持上海图书馆特藏部（古籍组、文献组、徐家汇藏书楼）工作时，顾老对我说：“你的责任就是要管好上海图书馆的二百万册藏书，这些都是前人留下的珍贵遗产，不要有任何差错。”80年代后期，耳闻北京有的图书馆实行读者看善本书要收费的事，还认为这也是适应“改革开放”的一种措施。我把此事告诉顾老，他听了，连连摇头，嗤之以鼻。他要求我，在上海图书馆，读者看善本书、普通古籍以及所有的文献资料，包括1949年以前的所有报纸期刊不能收费。他说：“图书馆的书是给人看的，不是商店卖商品。当年，张元济、叶景葵等人办‘合众’时，就是想办法保存图书文献，让读者来看书查资料、做学问。”

二

顾老是著名的书法家，我觉得他的书法功底是借助于字外的学问和修养，他既钻研书法技艺、文字结构、书体源流，也借鉴于历代名迹，熔铸古今，并推陈出新而形成自己的风格。1963年，他作为中国第一批书法家访日代表团的成员首次访问日本，代表团的团长是陶白（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另二位团员为著名书画家潘天寿、王个簃。1979年，他又作为上海书法家代表团成员访日，为中日之间的书法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他的小本子里有不少用小篆抄录的唐诗等句子，他是很谨慎的，每一字每一笔都不能错。第二次去日本时，他还将容庚先生编的《金文编》带在

身边，以便备查。他的书法擅长多种书体，尤精金文大篆，取法吴大澂一路，以宛畅颖奇、韵味隽永、质朴古雅见长。他童年时，得吴大澂书《篆文论语》、《篆文孝经》，即喜而摹之。早年在苏州，即受到父亲顾元昌（竹庵）先生和王同愈（栩缘）先生的影响，每天都要临摹碑版数十张，十几岁时已能执笔为人写对联了。竹庵先生要求他写字做到平整有力，而不要趋于媚美，并教导他每一个字都要“笔笔平凡笔笔神，寻常要在寻常出”。后又从其伯舅王董宸先生习古文字之学，由秦篆而进窥古籀。顾老年青时常去表兄吴湖帆先生家里，吴是著名收藏家、书画家，是吴大澂的文孙。吴早年的篆字笔力刚健，他写字时，顾老经常在旁观其用笔，顾老告诉我说，他受吴的影响很大。顾老中年曾致力于苏东坡体，明解缙曾评轼书云：“东坡丰腴悦泽，绵里藏针。”所以他的楷书又得力于苏字不少。记得有一次我在翻看《西楼帖》，顾师看到后说，这部套帖我早年临过。在北平求学时，即从胡朴安、闻宥、刘三等人学习古文字与书法。1932年，他考取北平燕京大学研究生，专研古文字学。在1935年5月出版的《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生名录》（1922—1935）中就印有顾老隶属于“国文部”，论文题目是《说文废字废义考》。

文革前，顾老为书法展览会或应友好之请，在图书馆里写字，从不用墨汁，都是我用墨磨就的。文革后，他发觉“一得阁”的墨汁很好用，而且托裱也不会化开，所以后来他写字就一直用墨汁了。1977年以后，顾老每到一处，都有人慕名来求书，而顾老多有求必应。1979年，顾老偕我去四川成都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主任委员扩大会议，期间顾老和我去四川大学看望徐中舒教授，当时林小安先生正从徐老习古文字学，知道我们在蓉城后，他就联合徐老的研究生在一家颇雅致的饭馆请我们吃晚饭。席间我说起前二天，有四川省政协委员杨先生来求顾老墨宝，送来不少纸，不光自己求，还附带为另外几位官员求顾老的书法，推也推不掉，

而且顾老此行不准备写字，所以笔和图章都未带。谁知，林小安说，这不难，同席的陈复澄是篆刻家，他可以马上刻就。果然，第二天一清早，陈先生就把刻有顾老名字和字号的印送来了。印篆得不错，刻得也好，顾老很是满意。当天下午，我就铺纸做好准备工作，顾老也就挥毫立就了。

许多人都喜爱顾老的书法，1987年10月，顾老和我去深圳参加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三届理事会，会议结束后，我们即去广州。广东中山图书馆馆长佟德山先生找到我，说无论如何也要请求顾老赐与墨宝，我代顾老答应了。谁知过了一天，佟馆长竟又拿来一长串的名单，我一数有十余人之多，包括中山馆其他负责人、办公室秘书、司机都有。我一看，只好说再商量商量吧。当我告诉顾老此事后，他笑一笑，说到上海再说吧。我陪顾老去过四川成都三次，每次去，他都要应人所请写字。1978年11月，他为四川省文学艺术联合会写了一幅叶剑英元帅的词，用大篆，极有气派，记得最后一句好像是“九天月揽，五洋鳌捉”。他还去过都江堰，那里的有关部门也请顾老写字，而且都是大字榜书，如“宝瓶口”等，有好几幅，这些作品都是在上海图书馆古籍组内的大桌子上完成的。在创作时，我和几位同事站立前后左右，看他挥毫，只见他执着大笔，凝气运腕，一笔一划，真有力透纸背之功。完成的几幅作品，张张精彩。老实说，每次看顾老挥毫，你都会觉得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享受。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从1978年起至1998年上半年止，在中国出版界所出版发行的图书中，题署书名最多的应该是启功先生和顾老了。我没有做过精确的统计，但可以说，从30年代初至1998年止，顾老题过的书名大约在三百种以上。不少作者都希望自己的著作有顾老的题签为荣，他们千方百计找关系、托人请顾老题署。我自己的著作已出版和未出版的也都是请顾老题的。就是有些出版社的编辑，也都喜欢顾老的题署。早在70年代初期，

上海的有关人员曾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和指示，点校、注释和印制历史古籍、古典辞赋诗词的“大字本”，有关人员就请顾老为这些大字本的注释稿题写书名。那时，顾老每题一签总是写几张，然后交给我，让我选一张，我选中的就在左下角用铅笔画一个小圈，再还给他。有时，顾老不来馆，就嘱人或司机将题签送来交我。他曾教我如何选、如何看。有时都不满意，他就用剪裁的方法进行拼凑，拼成一张最好的送出去。

饶宗颐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书画家，他也是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他的学问和造诣都是世人公认的。1991年初夏，我拟回上海探亲，行前打了个电话给饶先生，说是过两天我即返上海，不知有什么事需我做的吗？开始，他没说什么事，后来他突然说，你能否请求顾老为我写一幅字？我说这不难，要写什么内容呢？饶先生说，他是广东潮州人，家族的祠堂现在开放供各方游客参观，他早年读书的地方也在其中。他说能否请顾老写“选堂旧读书处”这几个字，做成匾可以悬挂。饶先生还说，现在能为我题字只有两位，一位是李一氓先生，可惜去世了，另一位就是顾老。后来我飞到上海的当天晚上，就去拜见顾老。我把饶先生的请求说了，顾老一口答应，并在我离沪之前交给了我。而饶先生在得到顾老的法书后也高兴非常。

由于顾老书法上的成就，不仅在国外赢得了赞誉（著名的美国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馆额即是他在访问期间写的），而且在国内有许多书法爱好者也都希望得到他的墨宝。除了一些博物馆、纪念馆、某些省的文物保护单位来函索题外，顾老经常收到求书者的信件。我在他身边工作，我很了解书法爱好者的求助，是给了顾老很大的激励，但是他的时间、工作、身体都不允许他能一一如愿。他有许多想做的事，他常常感到没有时间了。1987年10月，我在美国做图书馆学研究结束返国后，不止一次地劝说他，有些字可以不写，什么人都写，这太浪费精力了。我

甚至还想在他寓所门前贴上谢绝写字的告示。但顾老都没有答应。他说，有些人喜欢我的字，我不能拒绝他们。顾老的书法作品是从不卖钱的，这与如今商品社会中不少所谓书法家稍一动笔就要拿钱的不同。许多人都认为，我在他身边学习、工作了那么久，手头一定有不少顾老的法书。实则不然。1996年12月，上海图书馆的同事推出了顾老的书法展览会，这之前，有关同事就打长途电话到美国，要征求我收藏的顾老书法。实际上，很多人都不相信，我仅收藏有四张，二张是60年代全国、上海开书法展览会时顾老各写了二张，他选了一张送出，另一张说是要扔掉，我赶快收起来了。一张是70年代初期，他写的草书，是送给我和内子的。最后一张是我离沪去香港定居之前，我请顾老赐以墨宝留作纪念的。

清人刘熙载尝言：“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实际上，书法是道德文章的载体，也是反映写者的思想，抒发人生抱负的对象物，他们的德性连同他们的书艺、书法成就都对象化地到了他们的作品之中。对于顾老来说，他的书法作品，正是他抒情达意，畅怀自娱的过程，也是他修身养性的重要手段。他把他对文字的理解，用书法的形式表达出了他的品性、意识、情感、毅力，他也把自己的品行修养、学识水平融于其中，才能使之人如其书，而达到人与书法俱真、俱美、俱善的阶段。这也是唐柳公权说的“心正则笔正”、明项穆说的“人正则书正”，因为这些都是在揭示书法作品中蕴含着作者的气质、禀赋、个性、才情、学识和品德。

作者工作单位：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